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多维视角下的 皇权政治

朱子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多维视角下的 皇权政治

朱子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朱子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978-7-208-07388-3

I. 多... II. 朱...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496 号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

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

朱子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5 字数 384,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388-3/K·1379

定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绪 言

自上一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皇权政治与帝制时代政治体制的研究已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著。这些论著既有对原有观点的深化，又有对这一课题的创新。大而言之，似有以下几点值得学人关注：

其一，对中国皇权政治的发展历程作了阶段性的划分。钱穆称秦汉为“平民政府”、“士人政府”，魏晋是贵族政治，至明代因废丞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才成为完全的君主独裁政治。钱穆的观点虽不被当代学者完全认同，但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研究不能一刀切，必须作具体分析则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

其二，帝制时代国家机器的运作，是由中央决策体制所决定的，皇权政治确立以后，决策活动都是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决策集团中进行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央决策体制与中央行政体制有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密不可分，二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王亚南所撰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皇权政治下的官僚形态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发，被学术界视为扛鼎之作。如何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这两个似乎各自独立的专题作为一个统一体综合起来进行动态研究，这是深化这一课题的一大难点，白钢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第三、四章分别论述了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的

运作机制，对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互动关系作了十分有益的探讨，稍显不足的是按朝代论述显得较为繁琐，不易把握运作的规律和演变过程中的特点。

其三，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主义的理论。从三代迄清亡，王权主义是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核心，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到底，也就是帝王文化。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而思想文化的王权主义又根源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的确是发人深省，一言中的。

其四，中国帝制时代历时之久，在世界大历史中甚为罕见，故金观涛提出中国帝制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并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来研究。其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惜乎，不久即昙花一现，销声匿迹。笔者以为，对中国皇权政治及帝制时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可以从多角度、多视野，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上进行探究，在研究方法上应不拘一格。控制论、系统论不失为一家之说，仍可以继续研究。

用世界大历史的目光来看，中国皇权政治在世界上很有典型性，其历时之长，涉及之广，影响之大，思想积淀之厚重，功过强烈之反差，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罗马帝国君主、古埃及法老之权力不可谓不大，但同中国皇帝权力相比较，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三代以降，无论是出现英主明君，抑或产生昏君暴主，治乱兴衰，易代鼎革，但皇权支配社会的政治体制却没有改变，即使是农民军的领袖，也无一不做着称孤道寡的帝王梦。前段时间，人们常在谈“克隆”，有趣的是，这种克隆现象在中国专制政体中就不断出现，新建立的王朝即便比旧王朝吏治上要清明得多，但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却不会改变。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其实就是皇权政治。被史家奉为正史的、最具权威的二十四史，其实都是围绕皇权政治而展开的。除了

记录历代帝王将相行状的纪传外，志或书记载的也是与皇权政治相关的各种典章制度，这二者是互为印证的。司马迁特别推崇孔子的编年史《春秋》所弘扬的王道，其实也就是帝王之道，而《史记》上承《春秋》，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支柱。事实上，历朝历代编撰的正史都离不开这个根本性的主旨。不仅如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思想意识、文化形态都离不开皇权政治。皇权政治维护了国家统一，创造了灿烂而又丰富的中国古代文明，但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长期停滞，难以走出中世纪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虽然革掉了皇帝和皇帝制度，但皇权政治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很难从人们头脑中清除。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中国皇权政治的研究尚不充分，尽管学界近年来已经关注到皇帝制度及皇权政治，但一般皆作宏观层面的探究，有关的内容并无进一步的拓展。其实，皇权政治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深度和广度，没有涉及的专题还有很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中国皇权政治滥觞、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皇权政治对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当代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一般情况而言，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大多是专攻某个朝代，即以研究断代史见长。然研究中国皇权政治则必须突破以往常见的以“断代专题史”为经纬的研究体例。由于中国古制源远流长，作为前朝制度，虽常被后代视作“故事”，但因历史的斗转星移，其制必有因革增损，故明其“源”和“流”就成了研究古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中国皇权政治显然不能用治断代史的方法，而必须突破王朝体系，把握整个帝制时代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同时还需构建理论框架和体系。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探究，已出版的四部专著都和皇权政治密切相关。但笔者觉得开掘的深度还不够，这无疑是一个缺憾。因近年来有多部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及中国皇帝

制度的专著出版，故本书不再对中国皇权政治发展的历程作系统性、全景式的论述。笔者试图从多维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皇权政治，旨在加深研究的深度。当然，中国皇权政治是一个大题目，可以容纳的内容有很多，笔者的思路是：前人及时贤研究得较多、较透彻的专题均不再重复，力求达到较大程度的创新，开拓出皇权政治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共分六章，书中的每一个专题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也决非散乱无主，其围绕的中心就是中国皇权政治。读者可以从各个侧面来解读中国的皇权思想、帝王制度与专制政体。这是笔者撰写本书的主旨。

为了使读者能总览大要，笔者试在绪言中对本书的各个专题作一介绍。

一、易代鼎革：九锡与禅让制度

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禅让之形式。王莽、曹魏禅让是我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开端，它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政治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把王莽、曹魏禅让看成为中国古代禅让政治的分界岭，在此之前，是原始禅让政治，之后，则是皇权政治制度下的禅让政治。原始禅让政治与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禅让政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禅让。前者是原始部落及部落联盟时代的民主选举制度，后者是专制皇权下的政权和平过渡方式。

中世纪帝王之所以选择禅让作为中国皇权专制时代王朝更替的方式，乃是因为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遂以禅让的形式，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的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尽管如此，中世纪的禅让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礼治原则。它能把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限度，仅仅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牺

性甚至一人的牺牲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取天下的太平。相对于征伐与革命所带来的广泛杀戮来说，因禅让而发生的杀戮已经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帝制社会之禅让虽与上古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都不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故中世纪的禅让制颇有研究的必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禅让政治的载体是九锡殊礼，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即近似天子规格的礼仪及权力的九种器皿），然后登上九五之位。在王莽、曹操的实践下，西周分封制度下的九命之礼向皇权政治制度下的九锡之礼转化，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乃是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探索、改进与渐趋完善的过程。秦汉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皇权统治，但毕竟刚从三代社会脱胎出来，不仅皇帝独裁及忠君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而且其专制政体也不够完善，皇权的加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白钢先生认为：“划分中国皇帝权力形态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赵匡胤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皇帝的相对独裁时期，赵匡胤以后，可以称之为皇帝的绝对独裁时期。”^①在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谓是位高权重，在诸多方面可享受崇高的礼遇。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宰相、大将军，一旦

① 白钢：《中国皇帝》第1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出现昏君庸主，失去对兵权的控制，抑或天下动乱，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将军就有可能成为权臣，其加九锡、夺神器即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见，九锡制度乃是解读中世纪王朝更迭的一把钥匙。

魏晋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度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然由于史籍记载较为零星，缺少变化，故历代史家对九锡制甚少关注，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立“禅代”、“九锡”专条，作简要论述。

对于帝制社会易代鼎革的检讨，清人赵翼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两种形式，即“征诛”与“禅让”，顾颉刚亦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对这两种形式作了他自己的解读。然“文革”之前，学者却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征诛”，而重点关注的当然是农民起义，即农民如何以暴力革命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征诛”便成了当时的“五朵金花”之一。至于“禅让”，似乎只有上古社会的尧舜时期才有，而中世纪的“汉魏故事”、“魏晋故事”（指禅让）几乎被人们所忘却。九锡与禅代虽在二十四史中频频出现，却鲜有专文专著论列。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是较为全面地探究了九锡制度的缘起、嬗变、功能、盛衰及其与禅代鼎革之关系，并考察了九锡、禅代制在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中的运作轨迹。

二、皇权与朋党

朋党威胁皇权，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故历代君主均对朋党深恶痛绝。只要皇帝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就会使用严厉的手段对朋党予以制裁。但奇怪的是，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在朋党面前往往显得束手无策，软弱无能。皇帝虽然可以制订出禁止朋

党的种种法规，可以对结党的臣僚予以打击，甚至处以极刑，但对这个痼疾，就是无法根除。在封建王朝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朋党被消灭了，不久又会重新滋生出另一个朋党来，就像野草一样，年年清除，年年复生。而且到了帝制社会后期，党争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愈演愈烈。从帝制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汉、唐、宋、明四朝的主要党争，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残酷，规模范围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大。

为什么朋党屡禁而不绝呢？我们认为，朋党虽和皇权互相排斥，相互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体。在中国，只要有皇权政治存在，朋党就有了生存的条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帝制社会中，皇权虽然至高无上，神圣无比，但它又是极端孤立的。皇帝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个人能力来行使权力，统治国家。因此皇权的行使，就需要皇帝在整个统治阶级中寻找最忠于他的势力和集团，使这种势力和集团成为皇权的支柱，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核心。如李世民为夺取皇位，就笼络亲信，培植党羽，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帝位，从此秦王府的官员就成了唐代贞观朝廷的核心。朱元璋初登九五之尊时，大明洪武朝廷的主要文武官员都是他的濠州同乡，只是因为后来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集团的首脑功高震主，朱元璋才翦除之。即使像雍正那样极端憎恨朋党，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痛斥“朋党之罪，可胜诛乎”的皇帝，一旦到了他自己夺嫡时，也是利用年羹尧、隆科多等朋党势力“喋血宫闱”而坐上龙椅的。可见，归根结蒂，朋党是君主专制制度、皇权政治的产物，是封建王朝永远无法摆脱的幽灵。

三、强化皇权的工具：铁券与赐死制度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君主专制社会的至高法则。由于

天下臣民的生死荣辱皆操之于人主之手，因此君主给臣民以生的权利，“许之以不死”，在当时人看来，就是莫大的恩赏。为使天下臣民尽忠竭力，效命朝廷，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不久，就产生了铁券制度。所谓铁券，乃是帝王颁赐给有功之臣的、带有盟誓性质的一种特权凭证。获得铁券者可以在皇帝允诺的范畴内（谋反者除外）免死若干次，其免死特权并可荫及子孙。皇权政治有一个渐趋加强的过程。唐宋之前可称为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唐宋以降为皇帝绝对独裁时期。皇帝相对独裁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占有突出地位，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铁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形成规范化的制度，与皇权不够强大有关。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跋扈，不少君主连自己性命都朝不保夕，又怎能掌控臣工的生杀之权？因此，铁券的免死功能或有或无，免死次数或多或少，毫无规章制度可循，也就不足为怪了。皇权因衰弱而衰弱，铁券因皇权衰弱而衰弱。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帝制社会进入到明代，已建立起绝对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元璋一方面把颁赐铁券制度化，赋予功臣世官世禄，以此来维护皇帝和贵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铁券来限制贵族的种种特权。明初的功臣勋贵都有铁券，但其免死是有条件的，即“谋逆不宥”。凡贵族有对抗或削弱皇权的行为，皆可被视为“谋逆”，而处之以极刑。明太祖还对铁券免死功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从铁券的滥觞，嬗变，最后进入法制化的轨迹来看，其与皇权政治发展的脉络基本吻合。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可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归顺；剪除异己时，可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可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

忠不与铁券制度相对应的是赐死制度的盛行。在帝制社会里，君主所给予的一切，都是恩赐，甚至连处死都称之为“赐死”，而且成了死者的一种“殊荣”。商周以降，赐死制盛行不衰，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成了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①为何在专制制度下，人会“不成其为人”？笔者认为，人不成其为人因素当然有很多，诸如没有民主、自由，人格受到侮辱，思想被禁锢，生活极度贫困等等，但不可否认，自有人类以来，生存权是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而在帝制社会，君主恰恰就是控制了任何人的生死权。除帝王本人之外，一切有生命物体的生存都决定于君主，铁券与赐死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四、两重君主观与典型人物的忠奸辨

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调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忠君。但忠君的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稽考史籍，笔者发现，先秦社会士的忠君观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士可以忠于天子，也可以忠于他人。甚至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局面已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惟一的君主。他们的忠君观具有两重性，即不仅认为皇帝是君，诸侯、封君、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乃是周秦汉魏时期的普遍现象。

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和家臣结成了十分牢固的君臣关系，家臣高喊“家臣不敢知国”，根本不把天子、诸侯放在眼里。战国时期，养主和养士之间也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忠君思想的一种体现。东汉末年，“四世五公”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他们宁可忠于朝廷，也要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竟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

魏晋鼎革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玄学的兴起，不仅批判传统的忠君观念，而且出现了无君论思潮，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屣，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①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后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笔者对诸葛亮的忠君思想和司马昭的篡位说提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乃是对古代社会忠君观念和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章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以及魏晋之际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的忠奸问题作一论述与辨析。

五、皇权政治的特殊类型：垂帘听政制

皇权政治的特点决定了皇帝治理天下，必然要集大权于一身，即实行所谓的“乾纲独断”、“惟以一人治天下”。在此体制下，一些英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17，“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主明君或有作为、有能力的皇帝尚可以总揽大权，集中全力处理纷繁复杂的朝政国事。但是，能“乾纲独断”的皇帝在历史上并不太多。帝王制度下皇位世袭的特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暴君、昏君、庸主甚至白痴皇帝的不断出现。一些昏君庸主既然无能力独自操纵国柄，于是只有委政于左右心腹之人。谁是帝王最可信赖的亲信？从常理上来说，在古代宗法社会里，君主周围最亲近的，应是他的兄弟、叔伯、子侄。他们或封王，或封侯，以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君主的辅佐。然而，在攫取最高权力、坐上皇帝宝座的诱惑下，宗法血缘关系往往构成对君权的最大威胁，如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代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即是典型之例。宗室贵族们一旦实力增强，就与中央相抗衡，成为皇权的直接威胁力量；亲近的宗支，在血缘关系的作用下，往往成为君主皇位最可能的继承者或谋夺者。因此，君主对宗室子弟极不放心，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铲除或削弱这股政治势力。而被册立为后妃的家族，大多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即使出身庶族寒门，在与君主联姻以后，在政治上也会取得显赫的地位。就后妃而言，其家族的兴衰荣辱都系于君主之身，自然会对君主邀幸争宠。从后宫的角度来看，后妃属于帝王身边最亲近的人，司马迁分析道：“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而亦有贤后妃、外戚之亲以助教化。”^①君主为何要仰仗“贤后妃”？这是因为帝王和后妃有婚姻关系，这种婚姻关系不仅可以延续帝王家族的后代，还有助于牢固地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大多数君主认为，后妃擅政的威胁虽然存在，但与那些图谋不轨、冀图夺取帝位的宗室诸王、异姓诸侯、开国功臣相比较，要小得多。后妃和帝王或是夫妻关系，或是母子关系。夫妇

① 《史记·外戚世家》。

之爱非同一般，母子之情出于人之本性。因此，君主对后妃的信任，往往要超过自己的宗室血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本书中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作详细论述），帝王们为了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统治危机，就必须走女主摄政、行使皇权这着无可奈何的棋，以变通的方式来维持其家天下的统治。当然，处于两难状况下的帝王为了防止后妃权力的过分扩大，以至于威胁到帝王的家族统治，也绞尽脑汁，设置了种种防范措施，以避免酿成改朝换代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所以后妃临朝称制、垂帘听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成为封建王朝的成文大法，除《宋史》之外，其余二十三部正史几乎都未见垂帘听政的文本，直至清末，才被“凤居龙上”的慈禧太后强行将垂帘听政制列入《大清会典》。长期以来，后妃们虽然没有成文法的依据，但可以通过援引前朝先例的方式来实现垂帘听政。相沿既久，垂帘制业已深入人心，成为约定俗成的故事了。

自秦汉迄明清，曾多次出现过女主临朝、垂帘听政的现象，她们手握皇权，发号施令，成为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本章将以垂帘听政制的缘起、发展的历史过程，产生的原因，历代禁止后妃干政的措施，以及女主临朝的功过是非等内容为重点，作全方位的考察。

六、明代皇权政治面面观

君主专制主义固然贯穿于整个帝制社会，但其中仍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不少史家关注到皇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弱盛衰，其中尤以钱穆先生的论述最为精妙。钱穆称秦汉政权为“平民政府”、“士人政府”，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变相的封建势力下的社会形态”，称北宋为“贫弱的新中央”，称明代始出现“君主独裁政体”。笔者认为，钱穆对明清社会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对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研究确实不能一刀切，否则势必大而化之，不能精深。笔者在研究中国皇权政

治的过程中清醒地意识到划分“阶段”的重要性，且对中国皇权政治发展为“极端君主专制”的变局尤为关注。本章即以明代皇权政治为题，分八个小节作侧面考察。

(1) 胡蓝之狱是明初一大政治事件，也是明朝走向极端君主专制体制的开端。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曾撰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吴文考据精辟，厘清了胡惟庸之案的真相，但并未探究胡案产生的原因。笔者在文中揭示了胡党、蓝党两案产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同明初专制政治的关系。(2) 廷杖制是明代特有的刑法，其制的施行使“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尊严荡然无存，大小臣工从此只能匍伏于君主的脚下当奴才。(3) 迁都北京是朱棣为摆脱夺位阴影，巩固皇权，“控四夷以制天下”的重大举措，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不容低估。(4) 明代的“仁宣之治”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一样，是中古史上的盛世，体现了皇权政治对稳定社会、繁荣文化、发展小农经济的调控功能。(5) 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王朝，这和明朝建立的内阁制有着密切关系。明中期始，珰阁表里，阁臣倾轧，首辅、阁部之争无休无止，朋党参与其中，造成政坛的一片混乱。“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①黄宗羲的话确是精辟之论。(6) 明代有一套比较规范的采选秀女制度，但皇帝犹不满足，竟于常制之外，通过各种途径掠夺民间女子，致使天下扰攘，酿成拉郎配的奇闻。明代后宫盛行极其残酷的生殉陪葬制度，宫人稍有不慎，即遭杀身之祸，其命运极其悲惨。(7) 中国古代某些君主也深知治天下之不易，故煞费苦心，物色网罗当时最有学问的儒臣为其讲解经史，以之“资治”，提高自己治理天下的能力和决策水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